

总序：精神分析运动的百年回眸

本文为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之“中国精神分析研究丛书”总序。

取自王国芳/吕英军，《客体关系理论的创建与发展：克莱因和拜昂研究》，2011，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6年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诞辰150周年。许多国际精神分析组织将2006年定为“弗洛伊德年”，世界各地纷纷组织各种纪念活动，包括举行研讨会、学术报告、艺术展览、电影欣赏等。在弗洛伊德的故乡奥地利，总统菲舍尔（Heinz Fischer）亲自领导官方的系列纪念活动。我国学界和媒体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如北京大学举行了“中国——奥地利弗洛伊德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新闻周刊》、《南方周末》和《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对此做了报道。

如果以1895年的《癡症研究》一书作为起点，精神分析运动已经跨过100多年的历史长河，然而其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精神分析在创立之初不太被人们所接受。如1900年弗洛伊德出版的被后人视为“20世纪人类大事记的开端”的《释梦》一书，首印仅印了600本，却花了8年时间才卖完。直到1909年，应霍尔（G. S. Hall, 1844~1924）之邀，弗洛伊德等人到美国参加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与詹姆斯（W. James, 1842~1911）、铁钦纳（E. B. Titchener, 1867~1927）、卡特尔（J. M. Cattell, 1860~1944）等名家会面，并做系列讲演，才使精神分析逐渐被国际社会所公认。两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精神分析的快速发展，因为战争造成人类的巨大心理创伤，迫切需要心理安慰和治疗。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精神病药物治疗的发展，精神分析受到严峻的挑战。1990年美国《时代》周刊甚至刊发了《弗洛伊德已经死去》的封面报道。不过，神经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

又为精神分析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精神分析学家们力图借助神经科学使精神分析科学化。1999年《神经—精神分析杂志》创刊，2000年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学会成立。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得者埃里克·坎德尔（Eric R. Kandel）主张把现代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结合起来，打造精神病学的“新知识框架”。这也是弗洛伊德曾经的梦想。2004年马克·索姆斯（Mark Solms）在《科学美国人》杂志上发表《弗洛伊德归来》一文，阐述了现代神经科学为弗洛伊德理论找到的诸多证据。2006年美国《新闻周刊》做了《弗洛伊德并未死去》的封面报道，这是针对1990年《时代》周刊报道做出的积极回应。

由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既是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学说，又是一种治疗心理疾病的方法。它最初是从神经症治疗实践中产生的，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心理学的一个主要流派，被称为西方心理学的第二大势力。后来精神分析逐渐超越了心理学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涉及心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历史、神话、宗教、法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等广泛领域，开创了一场人类思想文化运动，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弗洛伊德主义”。目前，经过一百多年发展的精神分析早已成为一种常识，成为我们文化记忆的一部分，梦、性、潜意识、恋母情结等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因此，2006年杰里·阿德勒（Jerry Adler）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弗洛伊德就在我们身边》一文。正如他所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弗洛伊德是我们文化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可以说，弗洛伊德犹如幽灵一样在我们周围徘徊了一个多世纪。

一、百年历程：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逻辑

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精神分析运动并非一帆风顺，弗洛伊德本人及其后继者不断地对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进行修正和变革。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运动大致遵循着内部发展与外部发展两条路径。内部发展路径指的是，精神分析内部的不断分裂与重组、演变与发展。

其逻辑线索是：弗洛伊德所倡导的驱力模式，经过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阿德勒（Alfred Adler, 1870~1939）等人的过渡之后，进一步演化为自我模式、客体关系^①模式和自体模式，分别对应着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学派和自体心理学等，它们从学科内部推动着精神分析运动向前发展。外部发展路径指的是：弗洛伊德之后的精神分析从外部学科，如医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语言学等积极汲取养分，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把传统精神分析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分别出现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存在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和后现代精神分析学等，它们推动了精神分析运动向外发展。

（一）精神分析的内部发展路径

1. 古典精神分析及其分裂

一般把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称为古典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1917）一书中提出精神分析的两个基本主张，一是宣称心理过程是潜意识的，二是宣称性的本能冲动在引起神经性疾病和心理疾病的过程中起着极大作用。^② 潜意识和性本能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两大基石。他后来在《精神分析纲要》（1940）一书中又提出精神分析的两个基本假设：一个是关于心理的三种性质，即潜意识、前意识和意识的划分；另一个是关于心理结构的三个部分，即伊底、自我和超我的划分。这两个基本主张和两个基本假设基本上反映了弗洛伊德古典精神分析的主要思想。

潜意识是整个古典精神分析的最基本命题，也是最少发生分歧的命题^③，是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中岿然不动的根基。而性本能是潜意识的根源，也就因之成为精神分析的核心内容。弗洛伊德认为，人的

^① “object relation”，过去多译为“对象关系”，现在多译为“客体关系”。

^② 弗洛伊德（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版，第9~11页。

^③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论评》，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23~198页。

行为动机是潜意识的本能，并把本能分为生本能（包括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和死本能，前者表现为一种生存、发展和爱欲的本能力量，代表着人类潜伏在生命自身中的一种进取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驱力；后者表现为一种生命发展中的对立力量，代表着人类潜伏在生命的一种破坏性、攻击性、自毁性的驱力。其中，弗洛伊德更重视的是性本能，把性本能看作是潜意识活动的根源，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基本驱动力量。坚持把性欲作为人类活动的普遍动机因素，这是弗洛伊德的基本分析原则。^① 基于对性本能的看法，弗洛伊德提出了“幼儿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认为幼儿由于性本能冲动受到压抑，大多会形成“俄狄浦斯情结”，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人格发展阶段论，即心理性欲发展阶段理论。人格结构论的地位虽然不如本能理论，但也是弗洛伊德建立精神分析理论的过程中十分重要的建树。弗洛伊德在早期主要发掘潜意识，确立潜意识理论，此后，是提出伊底、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开始系统考察自我，这是逻辑发展的必然。因此弗洛伊德后期理论的建立时期也是自我心理学的启蒙时期。如果弗洛伊德可以活得更长久些，那么他或许会在自我心理学上提出更系统的理论，后来这项工作是由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 1895~1982）、哈特曼（Heinz Hartmann, 1894~1970）等人来完成的。

弗洛伊德的本能驱力理论，特别是性驱力理论，是其理论中最有争议的。他的生物本能论，特别是泛性论，就遭到荣格、阿德勒等早期追随者的反对，直接导致精神分析的早期分裂。荣格和阿德勒曾经是早期精神分析运动的核心成员，但由于无法调和的理论分歧，先后与弗洛伊德分道扬镳。荣格创立了分析心理学，提出了与弗洛伊德迥异的理论。他们决裂的主要原因是荣格不同意弗洛伊德将力比多解释为唯一的性能量，荣格把力比多看成是一种普通的生命力，后来他用“心理能量”一词取代了力比多，以此为中心创立了不同于弗洛伊德

^① 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主义论评》，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123~198页。

的人格动力学说。此外，在人格结构方面，荣格也摒弃了弗洛伊德对意识、前意识和潜意识的划分，代之以意识、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三部分。他认为个体经验仅仅是潜意识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潜意识的主要内容应包括人类世世代代遗传下来的原型内容。另外，虽然他们都承认潜意识的存在，但弗洛伊德强调的是潜意识的生物本性，而荣格强调的是潜意识的象征本性，即原型，原型的贮存构成了集体潜意识，这是荣格的核心概念。后来荣格思想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大有与弗洛伊德理论并驾齐驱之势。

弗洛伊德对于生物因素和性本能的强调同样引起了阿德勒的不满和批评，阿德勒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创立了自己的个体心理学理论体系。他认为力比多不是心理生活的决定因素，只有社会因素和个人生活经验才决定人格发展的方向。在对意识和潜意识的看法上，阿德勒在重视潜意识的同时，更为强调意识的作用，因而在人格结构中也更为强调自我。在阿德勒那里，自我具有积极性和能动性，人能通过“追求优越”来补偿自己的缺陷，以获得一个创造性自我。阿德勒强调的社会性和自我直接与弗洛伊德强调的力比多和伊底相对立，导致弗洛伊德的性驱力模式向自我心理学和社会文化方向发展。

2. 自我心理学

弗洛伊德一直以分析“伊底”作为理论的起点，但其在后期开始注重对“自我”的研究，其实，已预示着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萌生。使自我心理学得以合法化的推动者与奠基人是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她不同意父亲对伊底的过分重视，认为应给自我以应有的重视。安娜把分析自我作为解决所有精神分析问题的起点，确立了自我在精神分析研究中的地位。她于1936年出版了著名的《自我与防御机制》一书，总结并补充了其父亲所提出的自我防御机制，明确地把自我作为精神分析的合法研究对象。然而安娜的自我心理学并未超出其父亲的观点，她认为自我仍然受制于伊底，“在适当的情况下，自我并不

反对（本能冲动）这个入侵者，而是使自己的能量受它的支配”^①。

安娜虽然给了自我以合法的地位，但她的自我一味抵抗和防御伊底，也就离不开伊底，而发展自我心理学的关键任务是让自我离开伊底，成为一个独立的心理实体。这一工作是由哈特曼完成的。1939年哈特曼出版了《自我心理学及其适应问题》一书，提出了“无冲突的自我领域”（conflict-free ego sphere），从而为自我划定了一个独立的研究范围。此外，与弗洛伊德认为伊底先于自我、自我是从伊底中发展出来并为伊底服务的观点不同，哈特曼提出，自我与伊底一样都是遗传的，都是从先天“未分化的基质”中产生的，是同时存在的心理机能，具有自己独立的能量。在此基础上，他还提出了自我的自主性和自我的根本机能——适应的问题，适应是自我试图在心理机制内维持人和环境之间平衡的结果。适应概念的提出使自我走出了与伊底和超我的冲突，转向了人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这些思想标志着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正式建立，并扩展了精神分析的领域，将正常人的心理发展也纳入其理论，使精神分析走上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继哈特曼之后，玛勒（Margaret S. Mahler, 1897~1985）、斯皮茨（Rene A. Spitz, 1887~1974）、雅可布森（Edith Jacobson, 1897~1978）等许多自我心理学家致力于儿童的早期发展研究，试图深入地描述婴儿自我的发生发展过程。玛勒利用临床观察法考察母婴关系，对儿童出生后头三年的心理过程进行了推断，提出了自闭、共生和分离一个体化三个心理发展阶段；并指出，在自我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母亲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斯皮茨提出了自我形成的发生场理论，把发展看作是在一个场中从不稳定到稳定的一种进步。他把生命第一年中的微笑反应、陌生人焦虑和摇头说“不”等三种新的情感表达称为“心理组织者”（organizer of the psyche）。新生儿自我的正常发展就是这三个心理组织者依次构造的过程。雅可布森通过分析儿童自我的形成，阐述了心理结构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是一种整合性自

^① Freud, A. *The writings of Anna Freud*, Vol. 4.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1968, p. 3.

我模式，既保留了传统的伊底、自我和超我的结构，也包括了客体关系，即关注于父母与儿童的接触怎样促进儿童的自我和超我的发展。自我是从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但这是在内驱力的影响下发生的。^① 哈特曼等人的自我心理学代表着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运动的正统发展。

埃里克森 (Erik Homburger Erikson, 1902~1994) 是自我心理学领域又一杰出代表。他提出的“自我同一性”概念以及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对自我心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代表自我心理学向社会文化方面的转变。

3. 客体关系学派

当自我心理学在美国繁荣发展的时候，英国的一大批精神分析学者开始改变古典精神分析的理论基础，不再强调先天生物学因素，转而强调早期母婴关系对儿童心理发展的影响，形成了客体关系理论。客体 (object) 并不意味着无生命的物体，而是指爱、恨及渴望等带有感情的人性客体 (human object)。^② “客体”这个概念最早是弗洛伊德在讨论本能驱力和早期母婴关系的背景中开始使用的，而在客体关系理论家那里，对客体与客体关系的关注超过了对本能欲望的关注，他们对人格形成中的关系影响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强调。婴幼儿期对外在关系体验的内化形成了内部客体 (internal object)，这些内部客体反过来又会影响个体对外在关系的体验，也就是说，婴幼儿早期形成的内部客体就像内在的“模板”，影响个体对以后生活中其他人的感知和反应。客体关系学派最初产生于英国，后来经南美洲传播到北美和世界各地。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包括克莱因 (Melanie Klein, 1882~1960)、费尔贝恩 (W. R. D. Fairbairn, 1889~1964)、温尼科特 (D. W. Winnicott, 1896~1971)、克恩伯格 (Otto Kernberg,

^① Clair, M. S. (1986). *Object relations and self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p. 90, 37.

^② Jane Milton 等 (施琪嘉、曾奇峰主译): 《精神分析导论》，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年，第 41 页。

1928~) 等人, 他们分别提出了各自独立且不太统一的理论。

克莱因的工作是弗洛伊德理论向客体关系理论过渡的一座桥梁。她保留了弗洛伊德对本能的强调, 但又认为本能与客体有内在的联系, 驱力是表示关系的, 天生就是朝向客体的, 这改变了弗洛伊德认为驱力是无客体的看法。在生命之初, 本能驱力就出现在一个客体关系的背景中, 并被客体所调整。^① 婴儿寻找乳房和食物不仅仅是为了能量的释放, 更是为了关系的需要。这种对本能驱力和客体关系两方面的强调与弗洛伊德认为驱力是无目标的观点显著不同。在人格的结构问题上, 克莱因与弗洛伊德的观点也有所不同, 她认为自我在婴儿出生时即已存在, 超我也是在生命之初就被建立起来。她强调最初的婴儿内部幻想世界的重要性, 这是与部分客体相联系的充满了迫害和敌意的危险和焦虑的幻想世界, 它来自于婴儿自己的死的本能。婴儿通过不断地运用投射、内射、分裂等机制去控制强烈的需求、恐惧和焦虑, 使自己感到安全, 并建立客体关系。她从一个新的视角看待儿童心理发展, 用偏执分裂状态和抑郁状态描述婴儿早期经历的两种基本的精神状态。克莱因提出的客体关系理论, 既具有创新性一面, 但同时又保留了弗洛伊德理论的某些成分, 因而是一种过渡性客体关系理论, 并启示了其他客体关系理论家。

费尔贝恩提出了一个纯粹性客体关系模型, 认为人是被寻求客体所驱动, 完全否认弗洛伊德的人被本能驱力所驱动的假定。他认为人有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基本倾向, 吸吮拇指的儿童不是要获得来自口腔的快感, 而是用拇指作为代替物, 替代缺乏或不能满足的客体关系。客体不仅仅是内部的人物或心理的表象, 而且是心理活动的机能。他认为自我有自己的能量, 是建立关系的内驱力, 这就排除了伊底的作用, 从根本上改变了自我的涵义, 并通过自我的多重亚结构理论重塑了自我理论。

克恩伯格可能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客体关系理论的拥护者。他反

^① Clair, M. S. (1986). *Object relations and self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Brooks/Cole Publishing Company, p. 37.

对将驱力理论与客体关系理论完全分立的倾向，认为没有驱力理论的客体关系理论是不可能解释严重人格障碍的。^① 他坚持不懈地试图把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与客体关系理论整合在一起，提出了一个整合性客体关系模式。他使用弗洛伊德的术语，却认为客体先于内驱力，自我是人格结构的中心。生命最初是没有人格结构的分化的，感知和记忆是初级资源，凭借着感知和记忆，婴儿内化客体关系，成为自我的前体，一直到了俄狄浦斯期，压抑的防御机制才把伊底从自我中分离出来，伊底才开始存在，同时超我作为一个独立心理结构也出现了。也就是说，克恩伯格认为自我是从人际关系的内化中构筑和组织起来的，并且自我先于伊底，这与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是从伊底中分化出来、伊底先于自我的观点相反。克恩伯格这一观点的变化主要是为了强调自我功能和通过自我功能建立起来的客体关系。

4. 自体心理学

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是科赫特（Heinz Kohut, 1913~1981），他把精神分析的研究重点从本能驱力或自我转移到自体^②上，把自体在人格结构中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把自体看作是一个人心理世界的核心。他认为，自体本身就是一个动力源，它是整个人格发展的动力，因此，整个人格的发展与本能驱力无关。他通过临床上对自恋性人格障碍患者的研究和治疗，以及在温尼科特等客体关系理论家提出的自体感基础上，把自体、自体客体、自体病理以及治疗作为其理论和临床研究的核心。他认为，自体结构的缺陷而非“伊底—自我—超我”的冲突是许多人患病的原因。弗洛伊德把自恋看作是病理性的而且是不能分析治疗的；科赫特则认为人人都有自恋的需要，自恋在本质上是正常和健康的，自恋的性质取决于自恋在心理健康中怎样发挥作用。

自体心理学出现以后，精神分析内部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评价，一

^① Kernberg, O. F. (1975). *Borderline conditions and pathological narcissism*. New York: Jason Aronson, p. 271.

^② self, 译为“自体”，一译“自身”。

种评价认为自体心理学是继驱力模式、自我模式、客体关系模式之后精神分析发展中又一新的理论模式；另一种评价则认为自体心理学几乎否定了传统精神分析的所有核心概念，同精神分析理论已无本质的联系，因此它不属于精神分析阵营。我们认为科赫特对自体的强调是在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对传统精神分析模式的扬弃，用自体模式取代驱力模式并通过客体关系建构自体，是精神分析的内部发展中又一新的理论模式。

（二）精神分析的外部发展路径

1. 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

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产生并繁荣于美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社会现实和学术背景是其枝繁叶茂的沃土。它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动机和人格的动力学观点，但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影响，旗帜鲜明地反对弗洛伊德的本能决定论和性驱力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妮（Karen Horney, 1885~1952）、沙利文（H. S. Sullivan, 1892~1949）、卡丁纳（Abram Kardiner, 1891~1981）和弗洛姆（Erick Fromm, 1900~1980）。

霍妮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创者，她的研究围绕神经症的病理学展开。霍妮认为神经症的根源要从社会文化中去寻找，社会文化的矛盾造成的人际关系困难是产生神经症的决定性因素。因缺乏安全感产生基本焦虑，为了解除焦虑而产生神经症需要，神经症需要决定了神经症人格：顺从型、攻击型或退缩型，并使自我陷入真实自体、理想自体和现实自体之间的冲突之中。为了解决内心冲突，又发展出自谦、夸张和放弃三种策略，由于强迫性地使用其中一种又陷入新的焦虑和冲突之中，进而导致恶性循环。

沙利文特别重视人际间的相互作用对人格的影响，是精神分析人际关系理论的创始人。他用人际关系的理念解释人格发展与心理异常，使传统精神分析的重心从个体转向个体之间，从专注于个体内部的冲突转向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流、个体与环境（人际情境）的交互作用，冲击了传统精神分析对人格和自我的发展观，突出人际关系的

中心地位,把个体的自我和心理的发展置于人际关系的发展之中。因此,他认为对个体心理和行为只有通过人际关系才能解释和理解。^①

卡丁纳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了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的思想,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作用以及人格对文化变迁的影响。他强调文化因素对人格形成的决定作用,认为社会的初级制度通过影响个体的诸如喂奶断奶、排泄训练、性的禁忌等早期经验而塑造基本人格结构,而基本人格结构通过投射作用创造和影响神话、宗教等次级制度。这对于精神分析的传统模式是突破性的修正和发展。

弗洛姆是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中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影响最大的人物。他关注的是现代人所遭遇到的各种困境以及需要,试图以人本主义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达到改善现代人的处境和精神状态的目的。他从宏观上研究社会对人的影响,把精神分析引入社会历史的领域,提出了社会潜意识论、社会性格论、社会改革论等一整套影响广泛的思想体系,构成了视野开阔的社会精神分析说。

2. 存在分析学

存在分析学是存在主义哲学与精神分析心理学相结合的产物。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一批欧洲的精神分析学家试图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当时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开创了欧洲的存在分析学运动。他们主要是瑞士的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 1881~1966)和鲍斯(Medard Boss, 1903~1990)以及奥地利的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 1905~1997)等人。当代存在分析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的罗洛·梅(Rollo R. May, 1909~1994)、布根塔尔(James Bugental, 1915~)和英国的莱因(Ronald D. Laing, 1927~1989)等人。早期的存在分析学家如宾斯万格、鲍斯和弗兰克尔等人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与弗洛伊德所处时代的病因不同,主要是战争创伤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人们普遍感到人生的沮丧和生活的渺茫,这些关于人生目的和

^① 沈德灿:《精神分析心理学》,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361页。

生活意义的问题正是存在主义哲学所探讨的问题。因而他们很自然地把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结合起来，探讨人的心理生活并实施心理治疗。

宾斯万格和鲍斯的存在分析观点基本一致，都认为人的存在是在世界中的存在，即在世之在，是一个人的整体、此时此刻的存在。人存在于三个领域：周围世界、共同世界和自我世界，人的存在的动力和发展是自由选择。

弗兰克尔是意义治疗学的创始人，其理论基础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即意志自由、意义的意志和生活的意义。^①他认为神经症患者是在生活中迷失了方向，丧失了生存意义的人；人要摆脱困境就必须超越其存在，追求存在的意义，意义治疗就是帮助病人找回他的特殊意义。

罗洛·梅是倡导自由选择的存在分析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的整个理论体系都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受存在主义探索人生意义启发，他努力去发现人存在的真谛，探索存在的意义。他提出的存在分析心理治疗认为，心理治疗的核心过程是帮助病人认识体验自觉的存在，强调帮助病人恢复自由选择能力，使病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肯定自我。

莱因把传统的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创立了存在精神病学。他提出要将精神病患者的特殊经验置于“在他世界中的存在”的前后关系之中来理解，并进一步考察了精神分裂性个体的内部自身世界和外部关系世界，扩大和加深了传统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概念。^②

3. 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

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是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

^① 郭本禹：《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医学与哲学》，1997年，第9期，第495页。

^② 郭本禹：《从存在精神病学的创立到反精神病学主张的提出》，《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第86页。

代表人物是赖希（Wihelm Rich, 1897~1957）、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 1898~1979）和弗洛姆。

赖希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传统的精神分析没有重视患者的社会生活条件，而社会和经济支持才是对患者的治疗最必需的，神经症的治疗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因此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尝试将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认为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既具有各自的局限，又是相通的，如马克思主义不能正确地说明经济发展过程在实际上是如何被转变为意识的缺陷可以用精神分析加以弥补；精神分析不能把性问题和政治、文化环境联系起来的弊病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加以克服。但是这一结合因其肤浅和生硬遭到猛烈抨击，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均告失败。

马尔库塞不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晚年才开始了解和研究精神分析，但他从哲学的高度对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结合在综合的技巧上和思想上都比赖希略胜一筹。他运用历史的方法分析了本能概念，提出了“剩余压抑”和“操作原则”这两个具有历史含义的概念，并模仿马克思《资本论》中分析商品的特殊方法，将本能压抑区分为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认为额外压抑反映了本能压抑的不合理的社会起源。此外，他认为不能抛弃性本能概念，应把历史发展因素引入本能序列。但在最高的社会理想问题上，他把爱欲的解放作为终极目标，最终未能摆脱弗洛伊德生物学化的阴影，使二者的综合再次失败。

4. 后现代精神分析

后现代精神分析的代表人物是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拉康作为法国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后现代精神分析的创立者，他以结构主义哲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哲学基础和方法论工具，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进行了语言学的解读和重建。首先，他提出“回归弗洛伊德”的口号，力图重新唤起人们对潜意识的重视，并借助语言学研究发现了潜意识——语言——梦之间活动规律的相似性。其次，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体论，用想象界、象征界和现实界这

三种心理成分代替弗洛伊德的伊底、自我和超我。最后，他在传统的精神分析治疗观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治疗理论，将语言的重要性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认为精神分析治疗是一种话语治疗；治疗的目标就是揭示病人话语中流露出来的潜意识欲望；对于解释和移情的作用提出了新的看法；将精神分析机械而固定的治疗时间变更为弹性时间等等。

拉康以其反正统性、不确定性、破碎性和多元性等后现代的思维方式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发展和创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思想，并对哲学、历史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和文学评论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精神分析运动至今已经走过百年发展历程，弗洛伊德为精神分析大厦奠定了基础和框架，其后继者基于自己的理论和文化背景不断地进行着修正、变革和发展。无论是精神分析的内部发展还是外部发展都推动着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完善，使精神分析的影响不断扩大。精神分析运动的内部发展深化了对人的本质的看法。人类精神发展的显著标志是人可以探索自己的精神世界，弗洛伊德以潜意识为研究对象，进入了前人未曾触及的领域，为人类对自身的探索开创了新的纪元。后来者继续在这个领域深入研究：潜意识内容的研究重心由弗洛伊德的本能驱力逐渐转为理解自我的适应功能——研究自我，随之关注与自我的功能和发展紧密相关的自我与现实的关系——研究客体关系，随后聚焦于关系中的整体人的心理组织和功能——研究自体，研究重心逐步向人的更本质的层面推进，帮助人类更好地了解自己。内部发展线索同样深化了对人格发展的动力根源的探索。这四种理论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挖掘了人格发展的动力根源：弗洛伊德将本能驱力看作人格发展变化的推动力；自我心理学提升了自我的功能；将自我的适应作为人格发展的动力；客体关系学派将对客体的寻求以及早期母婴关系塑造的儿童的内心世界作为人格发展的起动因；自体心理学认为内聚性自体，即健康人格的发展来自于儿童的自体客体对儿童的积极作用和反应。精神分析的外部发展则扩大了精神分析

的影响。精神分析与医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哲学的结合，渗透到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领域，从而由一种潜意识的心理学理论与心理治疗技术发展为一种包罗万象的人生哲学。它已经不仅仅是一门心理学，还是当代一种主要的社会思潮，精神分析的不少概念和分析思路已融入日常生活语汇和一般思想文化观念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又被称为“弗洛伊德主义”。此外，精神分析对医学、教育、社工、护工等职业的渗透，使许多助人工作者，包括医务人员、教师、心理咨询人员、社会工作者等都把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结合到对工作对象问题的解决中，并发展为普通民众可以借以了解自己、分析他人、适应日趋复杂的社会人际关系、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有益工具。

二、百年交融：精神分析运动的整合逻辑

精神分析运动的整合逻辑与其发展逻辑相一致，也遵循着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两条路径。精神分析运动的发展逻辑表现为内部发展的分化与分裂、外部发展的汲取与吸收并存，但在看似不断分化与分裂的过程中，实际上又经历着不断的整合与统合过程。整合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克服片面性、极端性从而逐渐走向互相吸收、融合的历程。精神分析运动发展的历史也是不断整合的历史，表现在其不同发展阶段之间、其内部的各种模式之间以及它与外部诸多学科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其内部整合路径是指精神分析内部各种模式之间的整合，即对驱力或本能、自我、客体关系与自体模式之间的不断整合，包括雅可布森的自我理论整合、克恩伯格的客体关系理论整合、科赫特的自体理论整合和米切尔的关系理论整合等。其外部整合路径是指精神分析与外部邻近学科如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哲学、语言学、医学、神经科学之间的整合，包括社会文化学派的文化理论整合、存在分析学的人本主义理论整合、拉康的语言学理论整合和神经精神分析学（neuropsychoanalysis）的科学化整合等。

（一）精神分析的内部整合路径

1. 雅可布森的自我理论整合

雅可布森是一位重要的自我心理学家，其最大贡献在于提出了一个整合性自我模式。这一模式从自我心理学理论出发，对古典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和其后的客体关系理论进行了整合，既丰富了传统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同时也为理解整个精神病理学和正常发展范围提供了一个明确而宽泛的理论框架和实践指南。

雅可布森的自我模式没有否认传统的驱力模式，它保留了传统的伊底—自我—超我结构，但将它们放在客体关系的视野中，主张通过父母与孩子的相互作用以促进其自我和超我的发展。她仔细地审视了童年的经历，以论证本能、客体关系、心理结构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雅可布森还通过建立自体 and 客体表象与驱力或源自驱力的感觉之间的联系，从而将驱力和客体关系联系到了一起。她认为，在生命之初，驱力是未分化的，被投注到一个自体意象和客体意象的混合体上。雅可布森也明确区分了自我和自体表象，认为自我是一种结构，是一种具有各种心理功能的系统，源自一个自体意象和客体意象的混合体；自体表象是身体自体和心理自体在自我内的意识、潜意识和潜意识的表象，源自始于快乐和不快乐感觉的记忆痕迹的自体意象。但自我与自体表象之间需要一种关系的存在，以便提供客体意象。这样，雅可布森将驱力和客体关系通过自我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很好地弥合了弗洛伊德的驱力理论与客体关系理论之间的缺口，达到理论整合的目标。

总之，雅可布森创立了一个颇具包容性、整合性的自我模式，并研究了驱力、现实影响和客体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模式在传统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和客体关系理论之间建立了一个基本的连接。她修正并扩展了传统的概念，她的模式是继弗洛伊德之后最令人满意的结构模式之一。

2. 克恩伯格的客体关系理论整合

克恩伯格是当代客体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对传统和当代

精神分析理论的考察，发现这些理论所存在的缺陷，并在继承克莱因、雅可布森等人的理论观点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发现，提出了整合性客体关系模式。

克恩伯格认为，在个体出生之初，既没有伊底、自我和超我，也没有驱力。婴儿借助于先天的感知能力和记忆力将他与环境中的他人尤其是母亲的关系进行内化，形成了初步的客体关系。基本的客体关系单位包括三种成分，即自体意象、客体意象和联结它们的感觉或情感倾向。客体关系单位不仅是构成各种人格结构（包括自我、伊底和超我）的基本材料，而且还是构成驱力的基本材料。自我、伊底及超我都是由不同群集的内在客体关系组成的。驱力是由亲子互动中所体验到情感转化而成的。所有的情感都是从爱欲和恨这两类原始情感分化而来的。爱欲是以性兴奋为基础的，恨是以愤怒为基础的；性兴奋是力比多驱力的核心情感，恨是死亡驱力的核心情感；性兴奋和愤怒都属于生理反应。力比多驱力和死亡驱力不只是由单纯的情感累积整合而形成，还需要通过与重要客体建立各种关系而形成。

在克恩伯格对客体关系、情感和驱力理论的整合观中，驱力不再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起源于身体性欲区的单纯的生物学力量或能量，而是起源于儿童原始心理装备与最初所需要和期待的客体之间的整体关系。驱力包含着情感和客体关系成分。而情感在建立自体与客体表象之间的联系、构成客体关系的过程中又起着重要的作用。克恩伯格通过紧紧抓住婴儿与母亲相互作用中所体验到情感，将古典精神分析的驱力理论与客体关系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情感是客体关系和驱力中的共有成分。在克恩伯格的整合性客体关系模式中，客体关系、情感及驱力三者之中的每一种成分，都是以包含其他两种成分为自己存在的前提，三者几乎是三位一体的，而且每种成分都具有心理和生理、意识和潜意识、先天和养育等多个维度。

尽管克恩伯格还是保留了弗洛伊德的二元驱力概念，但他认为驱力不再是单纯的生物学力量所决定的，这使他与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论家有所区别；尽管克恩伯格仍坚持用客体关系的概念来理解和解释心

理世界的形成，但他所提出的客体关系理论中包含有情感和驱力因素，并且反对将驱力理论与客体关系理论完全分立的倾向，认为没有驱力的客体关系理论是不可能解释严重人格障碍的，这又使他与纯粹性的客体关系理论家如费尔贝恩有所不同。

3. 科赫特的自体理论整合

科赫特是自体心理学的创立者。他在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用自体模式取代了驱力模式，并通过客体关系建构自体，形成了精神分析的内部发展中又一新的理论模式。

科赫特的自体理论整合是在传统驱力模式之外的，他的观点大部分来自于他对自恋性人格障碍的精神分析。在人格结构和治疗观上，他都背离了驱力模式。首先，在人格结构上，驱力模式把神经症病人看作是有完整结构的人，带有用“伊底—自我—超我”来理解的结构，具有各种适应性和防御性的功能。驱力模式用压抑、俄狄浦斯冲突等来理解心理病理，而科赫特则把他的研究重点从本能驱力或自我转移到自体上，把自体看作是一个心理世界的核心，本能和自我都是从属于自体这一整体的。^①其次，在精神分析治疗观上，科赫特通过对自恋性人格障碍患者的研究和治疗，并在客体关系理论家提出的自体感基础上前进了一步，认为自恋与自体障碍意味着人格的真正中心结构是有缺陷的。也就是说，他认为自体结构的缺陷而非“伊底—自我—超我”的冲突导致了许多人患病。弗洛伊德把自恋看作是病理性的且是不能分析治疗的；科赫特则认为，治疗的实质是使病人有缺陷的自体能够继续因早期自体客体的创伤性失败而受阻的发展过程。^②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在于弥补自体结构中的缺陷，只要自体结构中的缺陷得到弥补，意识和自我的范围就会得到扩展，潜意识中的本能冲突也会迎刃而解。

^① 郭本禹主编：《当代心理学的新进展》，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64页。

^② 蔡飞：《自身心理学：精神分析的新范式》，《南京师大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4期，第84页。

科赫特的自体理论与客体关系理论的关联与融合，反映出他的观点在很多方面与费尔贝恩、温尼科特等客体关系理论家以及玛勒等自我心理学家的观点相似——都强调关系。^①但是，客体关系理论关注的是客体关系对个体知觉感受方式以及个体同他人关系的影响，而自体心理学一直把自体以及自体客体关系作为关注的焦点。而且在“自体”的用法上，科赫特与客体关系理论家们也有明显的区别，他使用“自体客体”与“真实客体”等概念来表达客体关系的体验性质量，而不用客体关系理论家们常用的“部分客体”与“完整客体”等概念。他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自体客体（selfobject），将其定义为这样一些人或客体：被体验为自体的一部分或为自体提供一种功能而被用于为自体服务的人或客体。他认为，形成自体客体移情是治疗自体障碍的前提，只有形成自体客体移情，病人才能在分析情境中继续其童年时期受到阻碍的发展过程，发展出弥补自体缺陷的心理结构，从而得到真正的治疗。

4. 米切特的关系理论整合

米切尔（Stephen Mitchell, 1946~2000）是当代精神分析关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试图寻找一种方法论，将不同的关系模式整合在一起，找到一种可以使传统模式成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模式；同时，运用这一广泛性的关系模式审视一些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领域，例如，性、幼稚行为和自体等。

米切特的关系模式摒弃了驱力理论，而在一种具有广泛性和连续性的框架下聚焦于关系模式。在这个关系模式中，人不再被视为一种欲望与外在现实不协调的、分离的实体单位，而被视为互动范畴内的人。在这个范畴内，所有的意义都产生于关系，没有什么东西是天生的。心理是由关系形态（relational configurations）构成的。人类的真正本质是寻找各种各样的联系，而不管这些联系是为了安全、合并、愉快或者依赖。人类形成并植根于关系基质（relational matrix）

^① Michael, ST. Clair & Jodie Wigren. (2004). *Object relations and self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Toronto: Brooks/Cole, p. 145.

和相互作用场 (the interactional field), 在这个场中, 个体努力去建立与他人的联系、维持这种联系或者分化其自身。在关系模式中, 研究的基本单位不是单个欲望与外部现实相冲突的个体, 而是相互作用场。个体的欲望、性欲高潮、身体体验均被看作关系的产物。因此, 关系模式的建立和维持被视为体验的核心结构, 并为人类体验提供了不同的分类范畴, 因而是最基本的结构。

米切尔认为, 性是互动范畴内的反应、表达或行动, 性与客体之间是相联系的, 性为关系结构的建立和维持提供途径。与驱力模式将个人的性作为人格的中心成分不同, 这种关系模式认为, 认同和连续性的维持是性的核心因素, 性体验及其在心理病理学中起关键作用的核心来自于互动和关系方面的内涵。米切尔还提出了发展连续性的互动观点, 反对那些只重视早期生活体验的“发展—抑制”模式或“发育跷跷板”模式。他认为, 早期冲突尤其是关系冲突, 是贯穿于生命始终的。生命后期出现的困难, 通常不是生命早期剥夺或问题的直接产物, 而是一种对早期体验的影响以及后来压力与冲突的反应的复杂结合。但他并不否认早期经验的重要性, 因为早期经验是家庭互动方式最早的显现, 并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的发育阶段不断加以重复。米切尔还认为, “幼稚行为”是重要的, 它涉及了婴幼儿期所体验的早期困扰在成人期冲突中再现这一核心问题。因此, 重要的是要通过了解过去作为理解现在的基础, 以获得患者怎样和为什么处理现在问题的信息。我们知道, 客体关系理论的自体模式重点强调多重性和不连续性。自体的体验是不连续的, 不同的自体组织是围绕不同的自体 and 客体意象而形成的, 并来自不同的关系模式, 而个体是这些相互重叠的复杂组织的合成物。但在米切尔看来, 自体存在感不会随时间而改变, 主观体验的连续性是自体感的核心。所谓的“自体”主要是通过与别人对立和建立关系而被定义和体验的。自体模式是一种在互动范畴内的组织模式, 充当着与他人联系的渠道, 或者用于解释联系一旦建立将怎样维持下去。因此, 用时空的维度去思考自体, 会使我们有一种比较丰富的体验自己的能力。

总之，米切尔对精神分析的驱力模式和客体关系模式进行了关系理论整合，对一些重要的精神分析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将不同的关系模式整合在一起，从而提出了独特而具整合性的关系模式。

（二）精神分析的外部整合路径

1. 社会文化学派的文化理论整合

社会文化学派对精神分析的整合表现为对本能和文化之间的整合。车文博先生曾指出，西方现代心理学的三个综合之一是文化派（指社会文化学派）对精神分析的综合，“新精神分析^①注意克服弗洛伊德的极端片面性，日益重视社会文化的因素，不否认意识的作用，甚至开始注意意识的机能”。^②

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妮、沙利文、卡丁纳和弗洛姆等人，虽然在理论上各有侧重，但都继承了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动机和人格的动力学观点及重视童年经验的传统，抛弃了驱力模式中的本能决定论、婴儿性欲论和人格结构论，同时他们都加入了社会文化因素，强调文化因素对人格的影响，将微观的家庭环境与宏观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研究人。例如，霍妮在治疗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心理问题的根源在社会环境，而不在生物本能。她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神经症的标准，而当前社会神经症的根源是个人在充满矛盾和敌意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基本焦虑。沙利文特别重视人际关系对人格的影响，将人际关系作为其全部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从人际关系寻找精神疾病的根源，确立了人际关系在精神医学中的重要地位。卡丁纳致力于对土著民族的现场调查材料进行精神分析的阐释，认为不同文化的基本制度造就了不同的基本人格结构，而人格也会对文化变迁产生反作用，形成不同的宗教和禁忌系统，他主要关注的是文化与人格的相互作用。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使人失去了与自然、与他人、与真实自我的密切关系，现代人虽然获得了自由，却陷入孤独和

① 即社会文化学派。

② 车文博：《西方心理学史》，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634页。

不安全的境地，这正是各种心理疾病的根源。他把心理现象放到广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社会环境中加以研究，创立了社会潜意识理论，开创了精神分析研究的社会取向。

社会文化学派对本能和文化的整合并非主要代表人物的个人行为，而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经受着各种压力和打击，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不断增多，用传统的驱力模式进行治疗在临床上已经行不通了，患者的问题主要不再是性压抑，而是社会生活的困境、人际关系的失调所造成的人格扭曲。新的现实促使精神分析学家寻找新的理论模式以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弗洛伊德的传统精神分析逐渐获得美国主流心理学的承认和整合，文化学派的成员们通过对文化理论的整合，逐渐开阔了精神分析视野，努力扩大了精神分析对美国社会和学术界的影响，使精神分析终于汇合到美国心理学主流之中。社会文化学派是“不同传统、不同学说之间相互综合的产物”^①。

2. 存在分析学的人本主义理论整合

早期的存在分析学家弗兰克尔、宾斯万格和鲍斯等人发现，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心理疾病患者的病因不再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性问题，而主要是因战争创伤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人们普遍感到人生的沮丧和生活的渺茫，这些人生目的和生活意义的问题即是存在主义哲学所探讨的问题。早期存在分析学家所关注的存在的本真意义、存在的方式、焦虑、内疚与死亡等主题，也是后来人本主义心理学所关注的问题。有人干脆把他们的学说看作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前驱。

当代存在分析学家罗洛·梅和布根塔尔的存在分析学更多地整合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他们本人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倡导的自由选择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斯洛、罗杰斯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自我实现论的代表）。他们的理

^① 郭本禹主编：《心理学通史·第四卷·外国心理学流派（上）》，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577页。

论体系是以存在主义哲学为基础，以精神分析为出发点，经过他们的心理治疗实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受存在主义对人生意义进行探索的启发，努力去发现人存在的真谛，探索存在的意义。他们提出的存在分析学心理治疗认为，心理治疗的核心过程是帮助病人认识和体验自我的存在，强调帮助病人恢复自由选择能力，使病人能够正确地认识和肯定自我。

总之，存在分析学家都受到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强调对人的存在进行分析，突出人本主义特色，实现了对精神分析进行人本主义的理论整合。

3. 拉康的语言学理论整合

拉康的精神分析学体系被研究者称为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语言学精神分析、后现代精神分析等，从命名的多样性就可以一窥其理论的多学科性和广泛性的特色。他站在弗洛伊德、索绪尔等巨人的肩膀上，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来解读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并对之进行语言学理论的整合。

拉康自诩为弗洛伊德主义的正统，关注的焦点是潜意识理论。他引入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思想，提出“潜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的重要命题。索绪尔把语言看成是一种符号结构系统，认为每一种语言都有一种独特的关系结构。他提出了“能指”与“所指”的概念，认为所指即概念和意义，能指是作为表达方式的声音或形象。在语言系统的结构体系中，每一个能指从属于一个特定的所指。拉康把能指与所指的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之中，认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潜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所以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用 S/s（能指/所指）公式来说明这一问题，并且有意把表示能指的 S 放在斜线的上方，以表示能指的优越性，而 S（能指）与 s（所指）之间的斜线则表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分离：主体总是在语言的能指链之中滑动，所指不能轻易到达。在人的意识的能指链中，那些回忆不起来的事情就会潜入到潜意识之中，通过变形如笔误、口误以及行为细节等表现出来。在拉康看来，

“潜意识作为一种欲望总会在语言结构的缝隙中，在漂浮的能指链上流露出来。潜意识并非无规律可循，它是具有文化性质的话语结构”，而潜意识中的变形以及变化正像是语言学中的隐喻和换喻。

拉康还从列维-斯特劳斯那里接受了社会符号系统、象征和结构等概念，不仅将“象征”转化为他的精神分析学中“想象”和“实在”鼎足而立的重要概念，而且重新诠释了俄狄浦斯情结中的三角关系。在拉康看来，父亲是社会符号体系中一个有名无实的符号，可用“父亲的名字”来取代，象征法权、父权和语言。在俄狄浦斯情结期，与儿童争夺母亲的对手不是父亲，而“父亲的名字”是这个没有所指的符号。俄狄浦斯情结的顺利解决，即儿童掌握语言（社会）规则，在象征界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地位。因此，拉康认为，“词的世界创造了物的世界”^①，语言产生了“我”，语言创造了人的主体性。人在进入象征关系的同时，也就产生了实在的“我”和符号的“我”的分裂，所以主体永远是“分裂的主体”^②。

拉康汲取多种学科的营养，表现出很强的科际整合能力，创建了庞杂而玄妙的整合性理论体系。由于其思想的多元性、反正统性和独创性，他对于当代诸多领域都有着重要的贡献。

4. 神经精神分析学的科学化整合

神经精神分析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门将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方法相结合的新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们希望通过借鉴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概念，整合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的整体、动态的心理过程，从而建立一门紧密联系心理与生理的心理科学，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临床实践。

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精神分析学和神经科学（包括精神病学）几乎是独立发展的，甚至一度出现了紧张的相互排斥局面。但随着神经科学家们对大脑的研究日趋成熟，一种描述心智如何产生于神

^① Lacan, J. (1977). *T Ecrits : A Selection*. London: Tavistock, p. 65.

^② 王国芳、郭本禹：《拉冈》，台北：台湾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1版，第171~175页。

经活动的生物学逐渐占据了上风。在神经科学处于优势地位的时代，比较符合潮流的看法是，受压抑的人们之所以不幸，不是因为他们婴幼儿时期发生的不愉快经历，而是因为他们大脑内的化学物质不平衡。但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神经科学和精神分析学结合的萌芽还是出现了，这标志着两个领域几十年对立的松动。进入 80 年代后，随着神经科学的快速发展，将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学相结合的呼声越来越高。在这一时期，潜意识成为神经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研究成果鼓舞了学者们的研究热情，神经科学开始借鉴更多的精神分析学概念来深化其研究。由此，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学的结合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不断的拓展。在研究领域上，神经科学不再囿于对精神分析学概念的验证，而是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框架对研究进行一定的指导；在研究方法上，神经精神分析学借鉴了两大阵营的主要方法，甚至逐渐产生了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的进步终于迎来了神经精神分析学的诞生。1999 年，《神经—精神分析学》杂志创刊；2000 年，国际神经—精神分析学协会在伦敦创建。它们标志着神经精神分析学的正式建立。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里克·坎德尔认为，精神分析学“仍然是最一致、最令人满意的心智理论”。他积极倡导将神经科学与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打造精神病学的“新知识框架”，并乐观地指出：“弗洛伊德的大格局的心智结构，似乎注定要扮演类似达尔文进化论对分子遗传学的角色。弗洛伊德可以作为模板，使新发现的各项细节安置得有条不紊。同时，神经科学家也正在为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寻找证据，并找出隐藏在他描述的心智过程背后的机制。”^①

当前，神经精神分析学在头脑关系、认知过程、情绪、动机与潜意识、人格结构、睡眠与梦、临床应用等领域都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表明了精神分析学正走向神经科学的科学化整合之路。

总之，精神分析运动的百年发展，一方面是学派的分化和分裂，

^① Mark Solms. Freud returns. *Scientific American*. 2004 (3). 2006, p. 42.

另一方面是理论的整合和统合。从内部整合路径看，安娜与克莱因的对立代表着自我心理学与客体关系理论之间的分歧，而自我心理学家雅可布森通过自我理论整合了古典精神分析驱力理论和客体关系理论。后来克恩伯格试图把弗洛伊德、克莱因、雅可布森和费尔贝恩的传统本能理论、客体关系理论以及发展理论整合为一个理论框架，提出了客体关系、情感和驱力理论的整合观。米切尔则致力于整合精神分析的各种关系理论。科赫特创立的自体心理学既是精神分析内部发展的新模式，又是在克服驱力模式的缺陷以及在吸收、融合客体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整合发展而来的。从外部整合路径看，无论是社会文化学派的文化理论整合、存在分析学的人本主义理论整合、拉康的语言学理论整合还是神经精神分析学的科学化整合，更多地表现出吸收和融合外部诸多学科的概念与理论，扩大了精神分析的影响。无论是内部整合还是外部整合都推动了精神分析运动不断向前发展。精神分析百年运动的分裂与整合过程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历程。没有学派的分裂，理论的整合便成了无源之水；没有理论的整合，新的学派或学说便失去了得以产生和成长的土壤。

三、百年传播：精神分析在中国^①

我国引进、传播、研究与实践精神分析大致有三个高潮，一是

^① 从前文讨论的精神分析发展逻辑和整合逻辑上，也大致看出精神分析在国外的传播情况。精神分析最初产生于欧洲，主要流行于维也纳、布达佩斯、柏林、伦敦和瑞士。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精神分析主要在欧洲特别是在德语地区流传。1909年，弗洛伊德等人应美国心理学家霍尔之邀，参加克拉克大学20周年校庆，并作精神分析演讲，与詹姆斯、铁钦纳等心理学名家会晤，使精神分析逐渐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一大批欧洲精神分析学家移民美国和英国，精神分析在那里继续得到发展。战后进一步在世界各地传播和发展。

“五四”运动前后，二是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前后，三是新世纪初前后。^①

（一）“五四”运动前后

1. 哲学界和心理学界的系统介绍

1919 年“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就精神分析学说被引进到我国而言，早在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1900）出版十余年后，就被介绍到中国。这一阶段表现出如下特点：精神分析的传播途径主要是以欧洲作为直接传播渠道，以日本作为间接传播渠道；在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些精神分析术语的译法与用法；精神分析术语的早期翻译折射出佛教文化的心态；在对精神分析肯定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局限。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精神分析逐渐隐退并淡出中国思想界，影响逐渐减小。

最早在我国介绍精神分析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我国第一篇介绍精神分析的文章是 1914 年钱智修所写的《梦的研究》（《东方杂志》，第 10 卷 11 月号）。作者指出：“梦的问题，其首先研

^① 因篇幅缘故，这里主要介绍精神分析在中国大陆的引进与传播情况，不过多涉及台湾地区的情况，尽管台湾地区有关精神分析的译著和著作对“文革”后大陆精神分析的传播起着一定的作用。

究者为福留特^①博士, Dr. Sigmund Freud。……福留特氏, 为吾人所不愿遇见之者, 乃至吾人所欲为所欲得者, 当于梦中实现之。”1920年, 著名哲学家张东荪发现当时译为“心解术”^②的精神分析, 往往到处只见其名而未多阐释, 于是写了《论精神分析》(《民铎》, 第2卷第5期)一文。同一年, 著名心理学家、小说家汪敬熙在《新潮》上连续发表《本能与无意识》和《心理学最近的趋势》(第2卷4号、5号), 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稍后有吴颂皋所写的“精神分析的起源和派别”(《东方杂志》, 1923年, 6月号)。张东荪还撰写了《精神分析学ABC》一书(ABC丛书社, 1929)。

早期介绍还有一些关于精神分析的译文、译著, 如著名学者胡愈

① 据职雍对《东方杂志》的查阅, 钱智修于1912年9月11日翻译的《罗斯福之心理解剖》一文(《东方杂志》, 第9卷3月号)一文中, 提及“福洛得”这可能是“Freud”名字在中文文献中首次出现。《东方杂志》(1904~1948)对“Freud”的翻译就有23处, 多达14种译法, 如, 佛洛依特、福洛得、弗劳得、佛洛特等, 出现的频率以“福鲁德”最多为4次, 其次为“佛洛特”和“弗洛特”各为3次。所有的翻译中, 以“佛”字开头的有9次, 以“福”字开头的有6次, 以“弗”字开头的有7次, 以“沸”字开头的有1次。中国人最讲名分,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 从这些不同的译法中, 我们可以了解当时中国人对精神分析的文化心态。以“佛”字开头作为弗洛伊德的翻译, 可以表明人们对精神分析的看法类似于对佛教的看法。从地域上讲弗洛伊德和佛教都不是中国本土产生的, 从内容上讲佛教和精神分析都注重对人类心灵的研究。以“福”字开头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渴求从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从而实现使国家昌盛、人民幸福的理想。以“弗”字开头则复杂得多, 在《变态的行为》一文中, 作者批判精神分析, 要打倒弗洛伊德的学说, 因而将其名字翻译为“弗劳得”, 取其讥讽之意。但“弗”字通假为“祓”, 有除灾求福之意。《诗·大雅·生民》中说:“克禋克祀, 以弗无子。”郑玄注:“弗之言祓也。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 乃禋祀上帝于郊禩, 以祓除其无子之疾, 而得其福也。”“弗”字既有否定又有希望的两种意思, 这也许恰恰表明了当时中国人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态度, 认为他的理论既有合理的、正确的成分, 又有一些荒谬的东西, 令人难以接受。(转引自职雍:《东方杂志(1904~1948)所载精神分析文献之研究》,《精神分析笔记》第4卷第2期, 2002年夏季刊)

② 当时对“psychoanalysis”的译法不统一, 有诸如析心术、析心学、心解术、通心术、心灵分析、心之分析、心理解析、心理分析、精神分析等, “精神分析”一词最初是从日文中翻译过来的, 后来逐渐被人们所接受。

之翻译了《梦中心灵之交通》（《东方杂志》，1918年，1月号）一文。著名心理学家高觉敷翻译了弗洛伊德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的五次演讲即《精神分析五讲》，并将之译为《心之分析的起源及发展》（《教育杂志》，1925年，第17卷10、11月号），是弗洛伊德本人著作在中国的最早翻译。关颖译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大师》（斯通著，上海翻译出版社，1927）、赵演译的《弗洛伊特心理分析》（〔英〕B. 勒著，商务印书馆，1929）和华超译的《心理学与精神疗法》（〔英〕布拉文著，商务印书馆，1929）是三本重要的早期译著。

精神分析在我国早期的传播中，章士钊、高觉敷等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国学大师章士钊很早就接触到精神分析。1923年在从欧洲回国的轮船上，他阅读弗洛伊德才出版十年的《图腾与禁忌》一书，却觉得“反复诵之，词气骤难尽晓，故中途执卷未释”。（《孤桐杂记》，1927）。1926年他从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位子上卸任，再次赴德，又一次接触了精神分析，甚至全文翻出弗洛伊德在1925年撰写的《自传》，也同时直接与弗洛伊德通信。1929年5月27日弗洛伊德回信给章士钊，对他有意在中国开辟精神分析这门学问的想法和他要为当时精神分析最重要杂志《潜意象》撰稿，表示非常满意和赞同。章士钊可能是与弗洛伊德直接联系的唯一中国人。他翻译的《弗罗乙德^①叙传》，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②

高觉敷不仅翻译了弗洛伊德在克拉克大学的五次演讲，还撰写了《谈谈弗洛伊德》（《一般》，1928年，第5卷2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学生杂志》，1930年，第17卷6号）、《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的批判》（《教育杂志》，1931年，第23卷3号）、《弗洛伊德与性教育》（《中学生》，1932年，第22号）等文章，并在《现代心理学》（商务印书馆，1935）一书中撰写了“弗洛伊德心理学”和“梦的心理学”两章。他还先后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

① 即弗洛伊德。

② 王浩威：《1945年以后精神分析在台湾的发展》（草稿，2004年9月1日），www.china-self-psychology.com/doc，2007-8-10。

馆, 1930) 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商务印书馆, 1936) 翻译成中文, 这对于中国学术界比较直接而又全面地认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功不可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高觉敷当时对弗洛伊德学说有清醒的认识, 他在《精神分析引论》译序中指出: “老实说, 我译此书, 目的是消极的。国内学人从震于弗洛伊德之名, 间或对于他的功绩作过高的估计。我现将此书译出, 好使读者明白弗洛伊德究竟是如何的一个怪人。读者若因为我译了弗洛伊德的一部书, 便以为我为 Freudian, 那么弗洛伊德纵肯收留, 我也呼冤不置了。” “总之, 弗洛伊德的学说, 毁誉参半。我们读书需抱持批判的态度, 读弗洛伊德的著作尤宜如此。”

2. 文学界的积极转述

精神分析在我国的早期传播, 除了哲学界和心理学界的介绍, 文学界的转述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新文化运动使得精神分析思想的传播伴随着中国新文学而兴起, “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与精神分析理论的联姻和精神分析理论的介绍基本上是同步的。^① 一大批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如: 郭沫若、鲁迅、周作人、潘光旦、张竞生、朱光潜、仲云、杨澄波、郁达夫、赵景深、汪敬熙、汪静之、俞平伯、壬秋、沈从文、施蛰存、废名、胡风、叶青、小默、许钦文, 等等, 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或受到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 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文学界对精神分析的积极转述在更大范围内促进了精神分析在中国的早期广泛传播。

1920 年 2 月 23 日, 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生命底文学》一文, 其中所讨论的精神作用和 energy 与弗洛伊德所谓的生命冲动、本能力等理论十分相似。他的两篇经典性的论文《〈西厢记〉艺术上之批判与其作者之性格》(《西厢》, 新文艺书社, 1921) 和《批评与梦》(《创造》, 1923 年, 第 2 卷第 1 期), 也都直接借鉴精神分析理论解说文艺问题。在第一篇论文中, 郭沫若就像弗

^① 陆扬:《精神分析文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 第 235 页。

洛伊德从达·芬奇的绘画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推断艺术家的性情以及家庭关系一样，也推断出王实甫是一个性变态者，并由此而分析作者对女性态度的超常表现。

鲁迅早在 1921 年就翻译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一书中的创作论和鉴赏论两章，并刊于《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上。1924 年，他又将该书全文译出。其中的“创作论”一章有专节介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这是一部对中国现代文学及理论批评产生很大影响的作品。鲁迅还创作过《补天》、《肥皂》、《弟兄》等精神分析色彩鲜明的小说，并明确表示是借用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故事新编〉序言》）^①。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于 1921 年在《东方杂志》发表了《福鲁德的隐意识^②与心理分析》（18 卷 14 号）一文，最早涉及弗洛伊德的文艺美学思想。他此后出版的《变态心理学》（开明书店，1930）、《悲剧心理学》（1933 年，英文版）、《变态心理学派别》（商务印书馆，1933）、《文艺心理学》（开明书店 1936 年版）等四部著作，均涉及到精神分析学说。

1922 年 12 月，由仲云所译的日本文学博士松村武雄的长文《精神分析学与文艺》在《文学周报》开始连载（第 57~71 期），这是见于 20 世纪中国最早的系统、明确阐述精神分析文艺美学思想的专论。此后，仲云又译介了《文艺思潮论》（《文学周刊》，第 102~120 期）、

① 毛正天：《精神分析学与中国现代性爱题材文学理论批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性爱文学与理论批评研究》，《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 年 8 月号，总第 5 期。

② 据职雍统计，仅在《东方杂志》上出现的 16 处对“unconscious”的翻译，有半觉心、无意识、下意识、隐意识、隐机、不起意识的、不意识的等译法，以“无意识”为最多，共有 8 次。翻译也是一种解读，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中国学人试图在佛教与精神分析之间进行沟通的努力。当然将“unconscious”翻译为“半觉心”、“隐机”、“不起意识的”也透出佛学词汇在精神分析中的影子。（引自职雍：《〈东方杂志〉（1904~1948）所载精神分析文献之研究》，《精神分析笔记》，第 4 卷第 2 期，2002 年夏季刊）

《病的性欲与文艺》、《文艺与性欲》（《小说月报》，第16卷），显示出作者要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释文艺现象的明确态度。

1923年，杨澄波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析心学论略》（第20卷6号），该文相当全面地论及了弗洛伊德关于梦、精神病、说谎、机智等方面与文艺的关系。

周作人早在1918年发表的《人的文学》（《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一文中，就提出了人的“复杂高深”的“内面生活”、“神性”与“兽性”“合起来”才是人性的观点。他无疑是受到精神分析学的明显影响，而且对精神分析学领悟较深，运用也较熟练。1922年3月26日，他在发表于《晨报副镌》上的散文《沉沦》一文中，倾心于弗洛伊德关于“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的看法。^①

郁达夫所写的《沉沦》（《晨报副镌》，1923年3月26日）与《猥褻的歌谣》（《歌谣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7日）算是弗洛伊德式美学的专论。

汪静之在《诗歌原理》（商务印书馆，1924）中，将艺术是“隐意识的发泄”作为内核，时不时现出精神分析理论的生动表述。

3. 具体应用的最初尝试

著名优生学家和社会学家潘光旦在20年代初次接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据他回忆，在1920年就读于清华学校期间，他就在图书馆发现英国学者霭理士（H. H. Ellis）的六大本《性心理学研究录》。此后一两年，他“又有机会初次和福洛依特的精神分析论和此论所内涵的性发育论发生接触”。他读到的第一本书是《精神分析引论》。1922年他以明末一个奇女子冯小青所谓影恋（即自恋）的绝妙例子，写成《冯小青考》一文；1927年他又在该文基础上，深入写成《小青之分析》（新月书店，1927），几乎用冯小青的个案演绎了精神分析学的新鲜见解。

^① 毛正天：《精神分析学与中国现代性爱题材文学理论批评——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性爱文学与理论批评研究》，《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8月号，总第5期。

张竞生在北大任教时译介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引论》，并竭力宣传融会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思想的独特的性爱理论，被称为“中国性博士”。1923年他在《晨报副刊》（1923年4月29日）发表的《爱情的定则与陈女士事的研究》，制造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大事件”。潘光旦的《冯小青考》和张竞生的《爱情的定则与陈女士事的研究》可以看作当时我国学者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具体应用的最初尝试。

在临床应用上，北京协和医院医师戴秉衡于20世纪30年代开展了将精神分析用于心理疾病的治疗工作。他也许是我国医学领域应用精神分析的第一人。另据文献记载，蒋介石曾经对精神分析很有兴趣并非非常好奇，曾经请心理学家萧孝嵘对他进行过若干次精神分析。但结果是失败的，蒋介石说这是一个错误，因为精神分析不符合儒家思想。^①

总之，“五四”运动前后，精神分析差不多同时从欧洲和日本被引进中国。从那时起一直到30年代，精神分析在中国的传播达到了第一个高潮。从20世纪40年代起，随着民族矛盾加剧，学者们纷纷改弦易辙，精神分析在中国思想界开始隐退和淡出。从新中国成立起到20世纪60、70年代后期，由于受学习苏联以及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对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西方思想主要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精神分析在中国大陆即使有声音也是被批判的。此外，自1950年以后，精神分析在我国台湾地区，先在精神医学界后在心理学界逐渐开始受到重视。到1966年，朱光潜以弗洛伊德为主要讨论对象的《变态心理学》在台湾出版；1967年高觉敷翻译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也再被印行；潘光旦翻译的蔼理士的《性心理学》亦在这一时期出版。这对台湾地区原本不准出版任何大陆的文人作品的出版审检制度而言，是一大突破。1968年后，以思想启蒙为己任的志文出版社出版的新潮文库，也由当时台湾喜欢精神分析的人士翻译了一批弗洛

^① 肖泽萍：《精神分析在中国能否奏效》，《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2年，第16卷第11期，第768页。

伊德的著作，如《图腾与禁忌》（杨庸一译，1968），《少女杜拉的故事》（文荣光译，1968），《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林克明译，1968），《佛洛伊德传》（廖运范译，1969），《梦的解析》（赖其万、符传孝译，1971），《性学三论》（林克明译，1971）等。除了弗洛伊德的作品外，新潮文库也译介了荣格、弗洛姆、梅宁格（Karl Menninger）、霍妮等人的著作。这一批翻译风潮从1968年一直持续到1975年才暂告一段落。这些译著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被引进到大陆，对这个时期大陆兴起的精神分析热潮起到过桥梁作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

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观念进一步更新，我国兴起了“西学热”，也出现了“弗洛伊德热”。这一热潮明显具有较大的广泛性和影响性，但也带有一定的自发性、盲目性。哲学界、文学界和心理学界对精神分析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弗洛姆、霍妮、埃里克森、弗兰克尔、罗洛·梅、莱因、马尔库塞等人的著作与思想进行了翻译、评论和研究。在此阶段表现出如下特点：“1986、1987年现象”，关于精神分析的许多翻译作品均在这两年出版；相对而言，介绍的多，评论的少，翻译的多，著述的少；对弗洛伊德、荣格、弗洛姆的翻译与评论远远超过阿德勒、霍妮等人；翻译与研究力量先以哲学界和文学界力量为主，心理学界力量紧跟其后，医学界力量还相对弱小；精神分析的临床应用还只是少数，临床培训更只是起步。

1. 关于弗洛伊德的翻译与研究

此间翻译的弗洛伊德本人著作和介绍其思想的著作最多，以高觉敷修订他解放前翻译的《精神分析引论》^①（1984年）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1987）最为经典，这两本书均被列为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最初大陆学者来不及进行翻译工作，主要是通过引进一些台湾地区的译本，如：《梦的解析》（赖其万、符传孝译，

^① 《精神分析引论》的出版被法新社记者称赞为中国真正“开放”的象征。

作家出版社，1986）、《日常生活的心理奥秘》（林克明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图腾与禁忌》（杨庸一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少女杜拉的故事》（文光荣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爱情心理学》^①（林克明译，作家出版社，1986）等。不久之后，大陆就出现了弗洛伊德著作的新译本，如《梦的释义》（张燕云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其他的一些译著还有：《弗洛伊德著作选》（里克曼选编，贺明明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②（林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艺术、文学、恋爱、宗教》（孙恺祥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弗洛伊德自传》^③（张霁明、卓如飞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知识出版社，1987）、《摩西与一神教》（李展开译，三联书店，1988）、《一个幻觉的未来》（杨韶刚译，华夏出版社，1989）。特别要提到的是谢韬主编、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精神分析学译评丛书”（1987），包括《文明及其缺憾》（傅雅芳等译）、《精神分析纲要》（刘福堂译）、《性爱与文明》（滕守尧译）等。

介绍弗洛伊德思想的译著主要有：《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霍尔，陈维正译，商务印书馆，1985）、《精神分析学说和艺术创作》（列夫丘克，吴泽林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弗洛伊德与马克思》（奥斯本，董秋斯译，三联书店，1986）、《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卡尔文·斯·霍尔，包富华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精神分析入门》（约瑟夫·洛斯奈，郑泰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弗洛伊德的爱欲论》（艾布拉姆森，陆杰荣等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分析学说的批评》（C. 克

① 包括《性学三论》、《爱情心理学》和《“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人的不安》。

② 包括《超越唯乐原则》、《集体心理学和自我分析》和《自我与伊底》。

③ 该书的另一个译本为《弗洛伊德自传》（顾闻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莱芒等，金初高译，商务印书馆，1987）、《弗洛伊德主义与美学思想》（霍夫曼，王宁等译，三联书店，1987）、《弗洛伊德主义评述》^①（巴赫金等，汪浩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精神分析与新弗洛伊德主义》（雷宾，李今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弗洛伊德主义与文学思想》（霍夫曼，王宁译，三联书店，1987）、《精神分析的过去与未来》（鲁本·弗恩，傅铿编译，学林出版社，1988）、《从弗洛伊德到荣格》（弗雷一罗恩，陈恢钦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精神分析》（王宁编，四川文艺出版社，1989）、《弗洛伊德究竟说了些什么》（克拉克，姚锦清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艺术与精神分析》（斯佩克特，高建平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精神分析学派的宗教观》（波波娃，张雅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对弗洛伊德思想的评论、研究取得了一批成果。“文革”后我国最初出版的三本高校心理学史教材，即高觉敷主编的《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唐钺编的《西方心理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和杨清著的《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0），均有专章评介精神分析学说，这三本书是许多人接触精神分析的最初启蒙读物。此间还出版了一批介绍和研究弗洛伊德思想的著作，如，《弗洛伊德——一个神秘的人物》（杨恩寰，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弗洛伊德传》（高宣扬，作家出版社，1986）、《精神分析述评》（张英，1987）、《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述评》（张传开、章忠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吴立昌，学林出版社，1987）、《弗洛伊德生平与学说》（洪丕熙，重庆出版社，1988）、《弗洛伊德与现代文化》（李铮、章忠民，黄山书社，1988）、《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王宁，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尹鸿，云

^① 该书另外的译本为《弗洛伊德主义》（巴赫金等，佟景韩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弗洛伊德主义批判》（巴赫金等，张杰等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

南人民出版社, 1994)、《爱欲人格——弗洛伊德》(李建中、尹玉敏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6)。

2. 关于荣格的翻译与研究

这个时期翻译荣格的著作也较多, 如, 《寻求灵魂的现代人》^①(苏克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心理学与文学》(冯川等译, 三联书店, 1987)、《回忆·梦·思考》(刘国彬等译, 1988, 辽宁人民出版社)、《人、艺术和文学中的精神》(卢晓晨译,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88)、《心理类型学》(吴康等译, 华岳文艺出版社, 1989)、《人及其表象》(张月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性与梦: 无意识精神分析原理》(梁绿琪译,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成穷、王作虹译, 三联书店, 1991)。

介绍荣格思想的译著主要有: 《荣格心理学入门》^②(霍尔等, 冯川译, 三联书店, 1987)、《荣格心理学导论》(F. 弗尔达姆著, 刘韵涵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荣格》(安东尼·斯托尔, 陈静、章建刚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心理危机与成人心理学》(约翰·拉斐尔、施陶德, 于鉴夫等译, 华夏出版社, 1989)、《荣格: 人与神话》(温森特·布罗姆, 刘楚安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9)、《荣格心理学与西藏佛教》(拉·莫卡宁, 江亦丽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94)。

评介与研究荣格的著作主要有: 《神话——原型批评》(叶舒宪,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神话人格——荣格》(冯川,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6)、《建造灵魂的庙宇》(刘耀中, 东方出版社, 1996)、《超越死亡》(刘耀中, 东方出版社, 1996)。

3. 关于弗洛姆的翻译与研究

^① 该书另外的译本为《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黄奇铭译, 工人出版社, 1987)、《探索心灵奥秘的现代人》(黄奇铭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寻找灵魂的现代人》(王义国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

^② 该书另一个译本为《荣格心理学纲要》(张月译, 黄河文艺出版社, 1987)。

这一时期翻译的弗洛姆著作也较多，如：《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申荷永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弗洛伊德的使命》（尚建新，三联书店，1986）、《爱的艺术》^①（陈维纲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禅与心理分析》（孟祥森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逃避自由》（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7）、《说爱》（王建朗、胡晓春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生命之爱》（罗原译，工人出版社，1987）、《精神分析的危机》（许俊达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对自由的恐惧》（许和平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梦的精神分析》（晨欣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精神分析与宗教》（郑维川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为自己的人》^②（孙依依译，三联书店，1988）、《人之心》^③（都本伟、赵桂琴译，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占有还是生存》^④（关山译，三联书店，1988）、《弗洛姆著作精选》（黄颂杰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恶的本性》（薛冬译，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人的呼唤》（毛泽应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健全的社会》^⑤（欧阳谦译，中国文联出版社，1988）。对弗洛姆的研究著作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陈学明，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

4. 关于阿德勒等人的翻译

在此期间，翻译的阿德勒的著作主要有：《自卑与超越》（黄光国译，作家出版社，1986）、《生活的科学》（苏克等译，三联书店，1987）、《理解人性》（陈刚、陈旭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翻译

① 该书的另外两个译本为《爱的艺术》（孙依依译，工人出版社，1986）、《爱的艺术》（刘福堂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

② 该书的另外一个译本为《寻找自我》（陈学明译，工人出版社，1988）。

③ 该书的另外一个译本为《人心》（孙月才译，商务印书馆，1989）。

④ 该书的另外一个译本为《占有或存在》（杨慧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⑤ 该书的另外一个译本为《健全的社会》（孙恺祥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的霍妮的著作主要有：《自我的挣扎》（李明滨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冯川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我们内心的冲突》（王作虹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翻译的埃里克森的著作是《童年与社会》（罗一静等译，1992）^①。翻译的罗洛·梅的著作有：《爱与意志》（蔡仲章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人寻找自己》（冯川、陈刚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翻译的弗兰克尔的著作有：《无意义生活之痛苦》（朱晓权译，三联书店，1991）、《人生的真谛》（桑建平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翻译的马尔库塞的著作是《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翻译的莱因的著作是《分裂的自我》（林和生、侯东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此外，《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尼·格·波波娃，李亚卿译，东方出版社，1988）和《从弗洛伊德到海德格尔》（阿·米·鲁特凯维奇，吴谷鹰译，东方出版社，1989）都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这两本书的篇幅均不长，前者评论了法国的后弗洛伊德主义者拉康等诸家学说，后者评论了存在分析学家宾斯万格、鲍斯、弗兰克尔、罗洛·梅和莱因等人的思想，给当时学术界带来了重要的精神分析思想的学术信息。

5. 心理学界的研究

在这个阶段，心理学界对精神分析的研究要特别提到车文博教授的工作。他从1986年开始，组织全国综合大学、师范大学和医科大学的专家，翻译了《弗洛伊德主义原著选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1989）。该书的上卷选辑了弗洛伊德的原著，下卷选辑了阿德勒、荣格、霍妮、卡丁纳、沙利文、安娜·弗洛伊德、哈特曼、埃里克森、赖希、弗洛姆、马尔库塞等人的原著。在此基础上，他主编了《弗洛伊德主义论评》（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该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为古典弗洛伊德主义，包括：弗洛伊德略传、弗洛伊德主义的历史背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方法、潜意识论、本能论、性欲论、梦

^① 该书的另外一个译本为《儿童期与社会》（孙名之译，花城出版社，1998）。

论、心理与人格结构论、焦虑论与心理防御机制、弗洛伊德的社会文化理论、弗洛伊德主义对西方现代哲学和科学的影响、弗洛伊德主义的贡献与错误和对我国出现“弗洛伊德热”的分析等，下编为新弗洛伊德主义，包括：新弗洛伊德主义的概述及其总体特征、荣格的“分析心理学”、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霍妮的“文化与哲学的精神病理学”、卡丁纳的“文化与人格相互作用理论”、沙利文的“人际关系理论”、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防御机制”与“儿童精神分析的理论”、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埃里克森的“自我心理学”、赖希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马尔库塞的“爱欲解放理论”等。这是当时国内对弗洛伊德主义最为全面的评论与研究。

6. 医学界的研究与临床应用和培训

在医学界，对精神分析的研究与临床应用要首推钟友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他就与同事们在首钢医院开展了精神分析式的心理治疗，提出“认识领悟疗法”，撰写了《中国心理分析——认识领悟心理疗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一书，为精神分析在我国的临床应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此外，上海的贾谊诚、天津的陈仲舜等人也在临床实践中应用精神分析方法。

对于我国心理治疗（包括精神分析治疗）实践能力的培训和提高，首先要提到一件事和一个人。一件事是1983年德国的葛拉赫（Alf Gerlach）和特洛依（Elisabeth Troje）博士等人第一次访问中国，参加在广州举办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介绍”的研讨会，心理学界的张伯源等人也参加了会议。这是中国最早召开的关于精神分析的学术会议。这里必须提到的一个人是德国的玛佳丽（Margarete Haass-Wiesegart）博士，她早在1976年就到北京大学学习哲学。1982年再次来到中国，成为北京大学恢复心理学系后的第一个留学生。这次她参观了北京、上海、成都，昆明等地的精神病院，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5年，玛佳丽等人组织了一次中国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赴德国参观考察德国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机构临床发展的

活动，参加人员有万文鹏、杨华渝、陈仲庚、沈德灿等人。这次德国之行，商定了在中国举办中德心理治疗研讨会的计划。之后以玛佳丽作为德方的协调人，以万文鹏作为中方的协调人，组织了第一次“中—德心理治疗研讨会”（昆明）。会议安排有各种工作坊，如系统式家庭治疗、精神分析治疗、来访者中心治疗、行为治疗等。精神分析治疗工作坊由伯格（Margarete Berger）教授、安姬·哈格（Antje Haag）博士负责。应该说这次会议开创了我国心理治疗（包括精神分析治疗）技能培训的先河。后来分别于1990年在青岛^①、1994年在杭州举办了第二次、第三次“中—德心理治疗研讨会”。这三次研讨会让一些中国临床医生初步接受了精神分析治疗训练，但这还不够，更为系统的培训则是后来的中—德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

总之，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弗洛伊德热”，历时10多年，学术界进一步对精神分析思想进行翻译、评介和研究，在临床上出现了少数的应用和初步的培训，为新世纪初前后的进一步临床培训与应用奠定了基础。此外，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以来，在我国台湾地区包括精神科医师在内的各种心理卫生专业人员数量显著增加，精神分析又开始获得年轻一代临床工作者的重视，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新型个案，如边缘型人格，都需要分析师具备精神分析的临床能力。从那时起，在学术界开始引进各种新的精神分析理论，尤以法国拉康学派为主；在实务界，以克莱因为代表的各种客体关系理论和科赫特的自体心理学，为临床工作者解决新的临床问题提供了指南。90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精神分析书籍被大量翻译出版，同时，至少有30多人前往伦敦（如 Tavistock Clinic）、巴黎、加州等地学习精神分析。

（三）新世纪初前后

新世纪初前后，随着我国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的需要，精神分析在我国再次热起来，又开始了新一轮出版精神分析译著和专著的热潮。这次热潮除受到学界和高校力量的推动外，还得到医生、咨询人

^① 青岛会议上成立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咨询专业委员会。

员的推广，这是实践需要的理性回归。此阶段的特点是：对精神分析的翻译工作继续进行，对精神分析的著述出现较快的发展势头；对荣格、拉康思想的翻译与研究相对突出；翻译、研究力量除了心理学界、哲学界和文学界，医学界队伍紧跟其后；精神分析治疗的临床培训与应用得到了极快的发展；精神分析的国际学术交流逐渐开展起来。

1. 心理学界、哲学界和文学界的翻译工作

这一时期精神分析著作的翻译工作主要有：车文博组织全国理论心理学与心理学史界中青年学者翻译了《弗洛伊德文集》（车文博主编，5卷，长春出版社，1998）。这套文集总计280万字，涵盖弗洛伊德的精神病学、心理学、美学、人类学、宗教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等诸多领域的经典性论著，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心理学为主线和基本内容。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套弗洛伊德文集。这套“文集”在台湾地区以《现代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文集》（分为8卷）出版（知书房，2000），2004年修订后分为8卷，仍由长春出版社出版。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精神分析经典译丛”，共6种，除了《后现代精神分析》（诺曼·霍兰德，潘国庆译，1995）外，均为霍妮以及研究霍妮的著作，它们分别是：《神经症与人的成长》（霍妮，张承谟、贾海虹译，1996）、《我们的内心冲突》（霍妮，王轶梅等译，1998）、《精神分析新法》（霍妮，雷春林、潘峰译，1999）、《一位精神分析家的自我探索》（派纳德·派里斯，方永德等译，1997）和《与命运交易》（派纳德·派里斯，叶兴国译，1997）。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精神分析经典译丛”（2000），共18种，主要是对弗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弗洛姆、霍妮等人著作的重译。^①从2006年起，国际文化交流出版公司又以“精神分析经典系列丛书”为总名称，按人头陆续推出弗兰克尔（George Frankl）、弗

^① 我国对精神分析著作的重译或重编现象较为严重，如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就有近10个译本。有的重译本为了追求经济效益，翻译工作可能不太严肃，但更多的译本却对精神分析在我国的进一步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

洛伊德、荣格、阿德勒、弗洛姆、霍妮等人的著作译丛。

关于弗洛伊德的其他译著还有：《弗洛伊德文集》（王嘉陵、陈基发编译，东方出版社，1997）、《弗洛伊德》（迈克尔·S. 特鲁普，李超杰译，中华书局，2002）、《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玛格丽特·玛肯霍普，潘清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弗洛伊德与虚假记忆综合症》（菲尔·莫伦，申雷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弗洛伊德的美学》（斯佩克特，高建平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师从弗洛伊德——我的私人笔记》（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王绪梅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狼人的故事：弗洛伊德心理治疗案例三种》（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李韵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此间关于荣格与拉康的译著较多，李以洪主编的“曼荼罗丛书”（东方出版社，1998），主要是关于荣格思想及其应用研究的8种译著。关于荣格的其他译著还有：《荣格崇拜》（理查德·诺曼，曾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荣格之道：整合之路》（戴维·罗森，申荷永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荣格》（R. 比尔斯克尔，周艳辉译，中华书局，2004）、《荣格的智慧》（荣格，刘烨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关于拉康的译著主要有：《拉康》（玛尔考姆·波微，牛宏宝、陈喜贵译，昆仑出版社，1999）、《拉康选集》（褚孝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拉康》（利德、格罗夫，张厚君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结构精神分析学——拉康思想概述》（穆斯达法·萨福安，怀宇译，天津社会学科出版社，2001）、《想象的能指》（克里斯蒂安·麦茨，王志敏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关于精神分析的其他译著还有：《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埃里克森，孙名之译，1998）、《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沙利文，韦子木、张荣皋译，1999）、《威利柯特^①》（亚当·非利普，龙卷风译，昆仑

① 即温尼科特。

出版社, 1999)、《弗兰克尔: 意义与人生》(威廉·布莱尔·古尔德, 翟凤臣、肖晓月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0)、《自我分析》(卡伦·霍妮, 许泽民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4)、《文学文本的精神分析》(J·贝尔曼—诺埃尔, 李书红译,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4)。

2. 医学界的翻译工作

在此间, 除了心理学界和哲学界, 医学界也翻译了一些精神分析著作, 如:《精神分析入门》(查尔斯·布伦纳, 杨华渝等译, 北京出版社, 2000)、《精神分析治疗指南》(罗伯特·厄萨诺, 杨华渝译, 北京出版社, 2000)、《精神疗法》(茨威格, 沈锡良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0)、《儿童心理治疗技术——心理动力学策略》(Morton Chethik, 高桦、闵容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2)、《现代精神分析“圣经”》(Michael St. Clair, 贾晓明、苏晓波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2)、《追寻生命的意义》(维克多·E. 弗兰克尔, 何忠强、杨凤池译, 新华出版社, 2003)、《精神分析案例解析》(Nancy Mc-Williams, 钟慧等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4)、《病人与精神分析师》(约瑟夫·桑德勒等, 施琪嘉、曾奇峰、肖泽萍译,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4)、《精神分析导论》(Jane Milton 等, 施琪嘉、曾奇峰主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5)、《汉、德、英、法精神分析词典》(李晓驷主译, 上海科技出版社, 2006)、《客体关系心理治疗理论实务与案例》(谢尔登·卡什丹, 鲁小华等译, 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6)、《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米切尔、布莱克, 陈祉妍、黄峥、沈东郁译, 商务印书馆, 2007)。医学界的翻译工作, 进一步推进了精神分析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

3. 学界的研究工作与研究成果

相对以前而言, 国内在这个阶段对精神分析的研究更为深入, 成果更为丰富, 且以心理学界的研究为主, 出版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在车文博主编的“20世纪心理学大师述评”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中, 收有:《心灵深处的王国——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熊哲宏)、《人类心灵的神话——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常若松)、《文化

困境与内心挣扎——霍妮的文化心理病理学》（葛鲁嘉、陈若莉）、《孤独无援的现代人——弗洛姆的人本精神分析》（郭永玉）、《寻找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刘翔平）、《寻找存在的真谛——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杨韶刚）。郭本禹主编的《心理学通史·第4卷·外国心理学流派（上）》（总主编杨鑫辉，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涉及对精神分析学比较系统的评介。王小章、郭本禹著的《潜意识的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对弗洛伊德主义及后弗洛伊德主义作了较为充分的评介。沈德灿著的《精神分析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是国内学者撰写的很有分量的一本研究精神分析专著。陆扬著的《精神分析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和方成著的《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讨论了精神分析在文学批评中的应用。

在此间，哲学界和文学界出版了几本弗洛伊德传记，如《弗洛伊德传》（欧文，华龄出版社，1997）、《弗洛伊德传》（徐信华，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弗洛伊德：文明的代价》（何仲生、余凤高，辽海出版社，1999）、《弗洛伊德》（汪锬，山东画报社，2002）。其他的几本关于精神分析的著作是：《精神分析与佛学的比较研究》（尹立，巴蜀出版社，2003）、《探视心灵——精神分析的源与流》（阮宜正编著，科学出版社，2004）、《揭开无意识之迷——精神分析》（张明主编，科学出版社，2005）、《精神分析学派与女性心理学的发展》（张海钟等，兰州大学出版社，2006）。

此间对荣格的研究较为充分。申荷永多年来研究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及其发展和在我国的应用，策划并组织了“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主编了“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丛书”（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还出版了《心理分析：理解与体验》（申荷永，三联书店，2004）和《荣格与分析心理学》（申荷永，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两本专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荣格神秘心理学丛书”，包括杨韶刚的《精神追求——神秘的荣格》（2002）和《炼石成金——神奇的炼金术》（2004）、施春华的《心灵本体的探索——神秘的

原型》(2002)和《心灵智慧的发现——神秘的梦》(2004)。这套丛书对荣格的神秘思想进行了系统研究。此外,程金城著有《原型批判与重释》(东方出版社,1998),冯川著有《荣格的精神——一个英雄与圣人的神话》(海南出版社,2006)。

因拉康在后现代主义领域中的地位,对他的研究也较为充分,国内学者先后出版了《拉冈^①》(王国芳,郭本禹,1997)、《后现代主义文化心理:拉康研究》(方汉文,上海三联书店,2000)、《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黄作,人民出版社,2005)、《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象》(张一宾,商务印书馆,2006)。《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马元龙,东方出版社,2006)。

郭本禹多年来在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过程中,有计划地对一些国内过去未系统介绍过的精神分析代表人物进行了系列研究,如亚布拉罕(Karl Abraham, 1877~1925)、费伦茨(Sándor Ferenczi, 1873~1933)、兰克(Otto Rank, 1884~1939)、斯皮茨、雅可布森、玛勒、克莱因、费尔贝恩、温尼科特(Donald W. Winnicott, 1896~1971)、拜昂(Wilfred Bion, 1897~1979)、克恩伯格、米切尔、科赫特、宾斯万格、鲍斯、莱因、拉康等人。郭本禹还主持了《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和《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的精神分析学研究专栏。

此外,车文博总主编的《弗洛伊德主义新论》(常若松、郭本禹、郭永玉分别担任上、中、下三卷主编)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郭本禹主编的《精神分析发展心理学》即将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郭本禹、王国芳撰写的《潜意识的意义——精神分析心理学》(上、下)即将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4. 医学界的培训与临床应用

1995年,玛佳丽再次来到中国,与中国同道讨论了在中国开展一项长程心理治疗培训项目计划。为了搭建一个将来合作的平台,同一年德方正式成立了德—中心理治疗学院(German-Chinese Acade-

^① 即拉康。

my of Psychotherapy)。① 首期“中一德心理治疗连续培训项目”为1997~1999年，每年两次集中培训。这是首次在中国按照国际标准进行心理治疗培训。这个培训项目分为精神分析治疗小组、行为治疗小组（包括催眠疗法）和系统式家庭治疗小组的培训。② 首期培训项目招收学员130名，大多数是精神科医师，少部分是心理学工作者。这开创了我国心理治疗技能系统培训的先河。这个培训项目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中德班”。第一期中德班已经形同传奇，成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心理治疗品牌。目前国内比较知名的心理治疗师都出自这个班。所以，中德班被戏称为中国心理治疗的“黄埔军校”。中德班从第二期开始是各个小组分开进行培训的。第二期中一德精神分析治疗连续培训项目为2000~2004年，第三期为2005~2008年。除了中一德精神分析治疗连续培训项目，还有中一挪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首期为2001~2004年，目前正在进行的是第二期中一挪精神分析连续培训项目（2005~2008年）。中一德、中一挪精神分析治疗培训项目为中国培养了一批精神分析治疗师。2004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国精神分析年会”，与会代表达400人之多，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精神分析的临床治疗实践。目前，中国各地的精神分析治疗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开办起来，积极把精神分析治疗技术应用到临床实践中去。

国内的一些学术组织和研究机构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精神分析临床应用的发展。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的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和中国心理学会的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咨询专业委员会还于2004年正式成立了精神分析学组。目前，在北京、上海、合肥、昆明、哈尔滨、成都等地已有心理动力学学术小组。所有成员都积极并坚持不懈地学习精

① 这是一个在德国正式注册的非盈利性组织，其目的是通过研究、教学、奖学金、讨论会和大会等方面的合作，促进中国与德国心理治疗知识的交流并且为两国带来利益。玛佳丽担任首任院长。

② 玛佳丽主编，《中德合作推进中国心理治疗事业发展》（1976~2007），德一中心理治疗研究院，2007，第17页。

神分析理论，进行着临床实践，进行小组内部交流，并邀请外国专家举办讲座，进行病例督导。此外，2003年申荷永在广州建立了广东“东方心理分析研究中心”^①，并在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支持下，组织与主持了第一届（1998年）、第二届（2002年）、第三届（2005年）“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1999年，霍大同在成都建立了“成都精神分析中心”^②，创办了专门的精神分析内部刊物《精神分析笔记》，开展精神分析的临床与教学工作，并开始严格按照国外培养精神分析学家的标准着手培养中国的精神分析学家。2004年6月，成都精神分析中心被正式接受为欧洲精神分析组织联盟（IAEP）的成员。

随着国家权威机构认证的心理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心理保健师成为正式的职业岗位，全国各地培训了大量的心理咨询、治疗、保健人员，这些人员的一部分又进一步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专门培训，从而使精神分析的临床应用得到进一步的推广。我国的一些综合医院、精神病院、民营医院和私人诊所还设立了具有精神分析治疗特色的心理门诊。

5. 逐渐展开的国际交流

中国的精神分析研究与应用是随着国际交流而积极开展的。中国的精神分析事业也得到了国际精神分析学术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中一德、中一挪精神分析治疗培训项目都是国际合作的结果。近年来，一些大陆精神分析治疗师前往欧洲等地进行学习和接受自我体验。为了推动精神分析在中国的发展，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成立了中国工作组，成员主要由在中国从事过教学和交流的及对中国精神分析事业发展比较关注的IPA资深会员组成。前任组长由有一半中国血统的阿根廷的特蕾莎·袁（Teresa Yuan）博士担任，现任组长为德国心理治疗联盟（DGPA）主席、德一中心理治疗学院副院长葛拉赫博士。例如，在2005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第44届年会上，开设了“当

① 以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为主要取向。

② 以拉康为主要研究取向。

代精神分析在中国文化社会中的新进展”主题分会场，举行了中国工作组的工作会议。分会场由特蕾莎·袁博士主持，葛拉赫博士做了题为《精神分析：关于中国文化的灵感》的发言，详细介绍了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首次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至今，精神分析学及精神分析性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和现状，以及精神分析在与中国文化交融中带来的启迪。中国大陆代表张天布、中国台湾代表蔡荣裕也分别作了发言。工作组会议中肯地评价了中国大陆近十年来的精神分析发展现状，包括对各个地区卫生和教育资源的配置情况、专业人员的受训水平和专业态度、核心成员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风格、教学和治疗工作开展的现状。会议还提出了未来发展的规划：积极争取在中国建立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联盟研究所（IPA Alliance Institute）或者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联盟中心（IPA Alliance Center）。对将来发展的考虑分两个部分，初级教学以后将逐渐由中国的教员承担；IPA和国际支持的重点要放在培养中国师资、IPA成员资质培训和IPA相关机构的建设上。葛拉赫博士指出：“在致力于中国精神分析发展的道路上，我们已经努力地走了许多年，这是我们能做好的第一步。今后的第二步将主要依靠中国的同志们自己走，而且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们开始从他们的第二步里得到了启发和学习。”^①除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IPA）中国工作组，德一心理治疗学院和国际促进中国精神分析学会^②都在为促进中国精神分析事业的发展而努力着。

总之，新世纪以来，精神分析事业在我国大陆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无论在翻译与研究上还是在培训与应用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推进，无论理论研究力量还是临床应用力量都在不断地增长。而且，两者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此外，自新世纪以来，我国台湾地区的

① 张天布：《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第44届年会纪要》，<http://www.xici.net/b25569/d33865657.htm>，2007-10-18。

② 该学会是2003年在美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旨在促进中国精神分析治疗方法的发展，现任主席为埃德华·罗宾斯（Edward Robins），他是国际拉康精神分析领域的重要人物。

精神分析事业也在进一步发展着。2001年11月台湾华人心理治疗基金会（Taiwan Institute of Psychotherapy）成立，2004年蔡荣裕、刘佳昌、杨明敏等人筹划的台湾精神分析发展中心（the Taiwan Cent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开始活动。2004年华人心理治疗研究发展基金会的台湾心灵工坊出版社，在临床实务工作者和精神分析研究者的合作下，逐步将弗洛伊德的著作重新翻译出版。期间台湾地区翻译的精神分析著作对大陆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海峡两岸的精神分析工作者也在不断地加强交流与合作。

四、丛书特点：“中国精神分析研究丛书”的出版说明

南京师范大学从高觉敷先生开始，长期关注精神分析学研究。在高觉敷先生逝世以后，我们作为他的弟子，继承先生的遗愿，仍矢志不渝地研究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形成了一支研究团队。在我们近十多年指导博士生和硕士生学位论文中，多以精神分析领域为选题，有计划地对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领域的一些重要代表人物，特别是国内还没有系统评介过的人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我们以这些博士学位论文和优秀的硕士学位论文为基础，扩展为系列研究专著，构成了这套“中国精神分析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共13本，它们分别是：《古典精神分析学的早期理论转向：兰克、亚伯拉罕和费伦茨研究》、《自我心理学：斯皮茨、玛勒、雅可布森研究》、《客体关系理论的创建与发展：克莱因和拜昂研究》、《客体关系理论的转向：温尼科特研究》、《独立学派的客体关系理论：费尔贝恩、巴林特研究》、《精神分析视野下的边缘性人格障碍：克恩伯格研究》、《整合性的关系理论：米切尔研究》、《自身心理学：科赫特研究》、《主体的在世之在：宾斯万格研究》、《从精神分析到存在分析：鲍斯研究》、《存在精神病学：莱因研究》、《后现代精神分析：拉康研究》、《精神分析的科学化：神经精神分析学研究》。本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学术性。本套丛书的每本书都有博士学位论文（部分为优

秀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经过导师的系统指导、论文的开题和答辩等工作,然后进一步修改和扩充而成,能确保书稿的学术质量和水平。二是本土化。每本书都包含一个或几个国内临床个案,用书中论述的精神分析学家的理论与技术进行系统的治疗与分析,以论证该精神分析学家的理论与技术的有效性,更是体现了其理论与技术研究的本土化和中国化特色。三是应用性。每本书除了对每个精神分析学家理论的阐述外,更注重对临床技术的讨论,包括心理病理学观点、治疗观点、治疗技术与策略、治疗效果和治疗个案等,同时包括中国的治疗个案,以强调理论的应用性。四是可读性。本套丛书在坚持内容的科学性、学术性和严肃性的前提下,尽量以通俗性、可读性的表述语境,进行深入浅出地叙事。注重挖掘每位精神分析学家的生平轶事,探究他们的心路历程,与大师们进行心灵对话。对专业性、技术性的概念和术语的介绍,尽量结合实例予以阐明。

我们组织编写这套“中国精神分析研究丛书”,旨在让更多的国内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精神分析重要学派和代表人物的理论观点与临床方法,从而为推动中国精神分析事业的发展做出我们的努力。

本套丛书的顺利出版得到了福建教育出版社社长、总编辑黄旭先生的大力支持,福建教育出版社教育理论编辑室主任成知辛先生和责任编辑沈群先生为丛书的编辑加工付出了辛勤劳动,特此致谢!

郭本禹

2007年12月10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